

梁启超
·
明治日本·
西方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日〕狭间直树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
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日
狭
间
直
树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87/35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日]狭间直树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3

ISBN 7-80149-491-1

I. 梁… II. 狭… III. 梁启超(1873~1929) - 思想评论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448 号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共同研究报告



编 者: [日] 狭间直树
责任编辑: 钟 闻 雁 声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6.625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91-1/K·058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文本序一

金冲及

狭间直树教授主编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中译本，是我期待已久的一本书，也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都值得一读的。

谁都知道，中国思想界在近代经历了空前剧烈的变动，它的突出特征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相碰撞而引起一系列深刻变化。这场思想大变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汹涌奔腾、谁也阻挡不住的潮流，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后开始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使许许多多原来麻木不仁以至盲目自大的中国人产生一种新的觉悟，认识到再也不能死抱着祖宗留下的旧有那一套继续生活下去，必须有一个大的改变。他们如饥似渴地尽力从国外汲取新的知识，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

那时候，在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普及新知识、推动思想文化革新方面，也许没有谁的贡献能够同梁启超相比。他那时介绍的西学几乎无所不包，涵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哲学、教育、史学、文学、宗教、伦理道德等等方面。这正适应着当时中国人渴求获得新知识的需要。严复当然也是极为重要的西学传播者，但他的译书“理深文奥，读者不易”。梁启超的文章却明白畅达，对人有着一股特殊的吸引力。他自己

说：“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清代学术概论》）这些话并没有夸张。它对中国思想界带来的巨大冲击，无论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称得上前所未有，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有如狭间直树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在上一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如果对这个时期的梁启超没有深刻的了解，对中国近代思想界发生的这场大变动也就很难有完整而真切的把握。

但是，梁启超并不懂得西文。他向中国人介绍的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都经过日本的中间媒介。他说严复翻译的西方名著“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清代学术概论》），而他自己并不能阅读西方书籍和报刊文章，无法直接了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最新成果和动向。他所知道的，其实只是经过日本学者选择和译介过来的东西，其中自然包含着日本学者自己的印记。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正发生着激烈的变动，新的问题不断涌现，思想界异常活跃，译介的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既多且快，并且往往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彼此间展开热烈的争论。这些，自然都会对留居日本、密切注视着日本社会的梁启超产生巨大影响。梁启超文章中的有些观点，其实并不是他自己的创见，而是用他那支“条理明晰”、“常带情感”的笔，对日本出版物中流行的看法加以概括和复述罢了。他所思考的问题，不少正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有时梁启超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发生陡然变化，也常同当时日本思想界的争论和变化直接有关。他接受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是由于读了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论》，尽管伯伦知理的学说在那时的日本已失去影响，但作为日本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知识积累，却适合梁启超的现实政治需要，所以，对他仍起了不小作用，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梁

启超这样说：他到日本后，“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三十自述》）。他所说的“思想为之一变”，正是置身日本、体验并吸收了明治时代文化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如果不了解当时日本思想界的种种状况，便无法了解梁启超是在一种怎样的文化环境和氛围中生活，也不能真正明白梁启超当时是怎样“变”的，为什么会这样“变”。

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但对中国学者说来，研究它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梁启超在日本受到的思想影响，不仅来自一些日本著名学者的著作，而且来自当时流行的为数众多的学校教科书、讲义和杂志文章，以及日本社会中已视为常识的普遍观念。梁启超有些很有影响的文章，甚至就是直接把日本教科书、文章的内容译成中文，而又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和他的理解有所损益，并增加一些自己的议论。面对范围如此广泛的研究对象，对中国学者说来，就更不易下手，而十分需要得到日本学者的帮助。

我早就知道，在狭间直树教授主持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正在进行对梁启超的共同研究，主题就是“西方近代思想的输入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参加者包括关西地区许多研究机构和团体的学者，历时达四年之久。1998年，我应京都大学的邀请，到人文科学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工作了半年。那时，梁启超的研讨班结束还不久，研究文集正在编辑中。我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的书架上看到，整整几排都是梁启超当年曾经阅读过的日文书籍和杂志。许多明治时代的图书杂志即便在日本也已不易觅得，他们花了很大力气，从国会图书馆等处的藏书中找到后复印装订成册，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坐在这里，仿佛就置身于一百年前梁启超的图书室内。我既对他们这种研究环境感到羡慕，又对他们这种研究精神深感钦佩。

现在，这个研讨班的论文已经结集出版，并被译成中文准备

在中国出版。我有幸在发稿前能先睹为快，获益良多。论文集中许多文章细致地剖析梁启超的言论同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井上哲次郎、井上圆了、德富苏峰、浮田和民、志贺重昂、姉崎正治等人的著作以及当时日本流行的种种观念之间的关系。许多文章对梁启超在日本期间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勾勒出清晰的脉络线索，并且提出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十多篇文章相互间各有分工和侧重，涉及的不仅有梁启超的社会政治思想，并且包括他的经济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宗教思想等等，综合起来，构成一幅相当完整的全景式图画，这也许正是“共同研究”带来的显著优势。认真地读一读这些文章，就像狭间直树教授所说的那样：“也许大家可以理解到日本明治时期文化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文明史的转型是如何密切地关连。”它不仅回答了我许多原先不很明白的问题，并且帮助我扩大了眼界，进一步认识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时不能不努力了解其他有关国家的思想文化史，认识到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的极端重要性。

狭间直树教授嘱咐我为本书的中译本写几句话。写下这些，只能说是自己读完这部书稿后的一些初步感受。

中文本序二

张朋园

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计划大功告成，同步以日文及中文发行，值得庆贺。狭间教授要我为中文版本写一篇短序，我感到非常荣幸。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影响，同时代的思想家几无出其右者。但是历史学家对梁氏的研究显然不足，数十年来称得上有所认识的著作，屈指可数。为什么没有较多的学者投入，原因固然不很简单，最基本的，恐怕还是梁氏的思想渊源没有得到深入的分析。梁氏的思想有其阶段性，可以简单划分为流亡日本及其前后三个时期。流亡之前，他受康有为的影响，已有不少讨论；但他在日本14年期间，受西洋及日本学术文化的影响，直到这批京都研究成果推出之前，我们的了解可谓皮毛。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梁启超在日本读过些什么样的书？他自己说：到达日本之后，见其学术界朝气蓬勃，出版品琳琅满目，“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从前在国内患无书可读，在日本则可读的书太多。读日文书数月之后，“思想为之一变”。梁启超读和文著作，受日本学者的影响，这一个复杂的问题，只有日本学者能够深入探讨。我们苦等数十年，终于有京都梁启超研究成果的问世，十分令人兴奋。

京都计划是一个由15位学者组成的集体计划（team work）。他们得母语文字及研究环境（原始资料）的方便，达到了预期的

成果。我自己曾经主持过集体计划，体会过共同研究的优点和缺点。集体计划通常是研究范围较为广阔的主题，有宽展的视野，可以得到涵盖多层面的结论，这是长处。但集体计划不容易整合，前后难于连贯，有时甚至于流于各说各话，这是缺点。京都梁启超研究充分发挥了集体计划的优点，避免了缺点。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令人激赏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和组织，整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史学家和相关科系的学者，经常举办小型讨论会，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四年计划执行期间，名闻遐迩，远在法国的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教授与美国傅果（Joshua A. Fogel）教授也来参加，增色不少。我读毕全书，觉得各篇论文均有所发现，为前人所未见及，是一个空前的研究成果，对梁启超研究是一个突破。

诚如书名所示，本书主旨在研究梁氏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一个过程是通过日本明治时期的文化完成的。在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有如在日本一家日本大师傅所经营的西餐馆吃牛排，经过消化吸收，变成热能，产生力量。牛排可以产生一定的热能，大师傅的烹饪手法和所加的佐料，虽然不会改变牛排的本质，但可以左右食用者的味觉，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梁启超通过日本大师傅所获得的西方知识，受明治文化的影响，应予重视。这是本书的架构。的确，梁启超读了不少日文翻译的西方著作，也读了许多日本学者关于西方知识的著作。那时的翻译，不像今天要求十分谨严，难免错误，或武断其意。学者们的著作取材西方思想家的原典，也不一定遵守原意。为了适合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或改头换面亦是有的。梁启超在吸收接纳的过程中，很难判断翻译或著作与原典的距离，往往囫圇吞枣地就接受了。梁氏所得的知识，再经过自己的转化，变成所需要的“热能”，难免又有所改动或武断之处。本书对于梁氏吸纳新知的过程有很细腻的描写。

本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梁启超思想的重要内涵都讨论到了。

例如“新民说”是怎样来的，自由、权利与国家的关系如何，从革命到立宪的由来，儒家思想、佛学思想、经济思想、文学传记思想等，均一一论列。以新发现的资料充实他们的议论和解释，发前人所未发，见解新颖而甚平实。例如结论中说：就其思想形态而言，梁启超是一个史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人们并不在意他有什么原创性的思维，但不能不感激他从日本转化过来的知识，使中国人的蒙昧得到启迪。这一类的见解，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本书值得一读。

京都学派为我们解决了梁启超在日本的迷思，本书无疑是梁启超研究的里程碑，往后便是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了解，盼望海内外还有更多学者投入，推动新的计划。

中文本序三

杨天石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梁启超研究班的共同研究成果《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即将出版中文本，狭间直树教授要我写篇序。本来，金冲及和张朋园两位大家已经写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但是，我和狭间先生相交二十余年，盛情相邀之下，又似乎不可无言。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办《新民丛报》，办《新小说》，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广度介绍西方新思潮、新文化，同时则甩掉“托古改制”的外衣，鲜明地提倡改革中国的旧思想和旧文化。例如，倡导“国民性”改造，呼唤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一代“新民”的诞生，又如，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曲界革命”、“道德革命”、“经学革命”、“史学革命”、“宗教革命”，等等，在当时，都是震动人心的号召。这一段，前后不过数年，可以说是梁启超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其成绩，其影响，既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也超过了戊戌时期的梁自己。梁的上述种种工作不但在当时引领风骚，开辟生面，而且下启“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转型，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以至中华民族的精神境界方面都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应该承认，在近代中国，超过这种影响的历史巨人并不很多，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一个。1905年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

命民主派兴起，梁启超虽然逐渐失去其在政治方面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革命党人热衷于“光复旧物”、“保存国粹”，在文化上，始终无法和梁启超的影响抗衡。

梁启超在日本的这一段虽然很重要，学术界多年来的研究却很不够。其原因，固由于受到“革命”、“改良”一类条条框框的禁锢，但主要原因则在于隔膜——对明治时代日本的隔膜。人是环境的产物，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鸦片战争以后通过各条渠道传入中国的西学以及救亡维新的康有为之学，凡此种种，是形成梁启超思想文化性格的外在因素，这些我们易于理解。但是，明治日本，也是形成梁启超的思想文化性格的外在因素，梁到日本后所介绍的西方文化，实际上是经过日本人消化、吸收、重新改铸过的明治文化。对此，人们就不一定很清楚；或者，虽然清楚，其了解却并不一定具体；要真正研究起来，困难就更多。学术上有所谓疑点、难点，我觉得，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就是这样的难点之一。因此，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题目选得好。选择这个题目，反映出一种高明的学术眼光。

四年来，这个研究班集中了京都、大阪、神户地区的一批学者，以京都学派固有的扎实学风，“上穷碧落下黄泉”，广泛收集一切可能收集到的资料，然后，在总的主题范围内各就其兴趣所在选择一个题目，深入钻研，同时又相互切磋，反复讨论，使个人和集体的智慧都得到充分发挥。现在，这个研究班的成果奉献于读者面前了。打开本书，人们可以具体而微地了解明治日本和明治文化对梁启超的影响，方面既广，内容尤有深度，对梁启超的研究是一个相当大的推进，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端。

近代中国，除不少爱国者、革命者流亡日本外，大批年轻人留学东瀛，他们的思想、性格无不受到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可以说，不研究日本就不能深入地研究这些流亡者和求学

者，更不能理解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事件。例如，不研究 20 世纪初年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左派，就不可能了解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人的思想；不研究当时日本社会党的分裂，就不可能理解同盟会的分裂。如此等等。推而广之，不深入研究 19 世纪末年至 20 世纪 20 年代的欧美社会及其文化，我们就很难理解孙中山及其同辈；不深入研究苏联，我们也就很难深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因此，我觉得，这本书，不仅向学界展示了许多关于梁启超的新颖学术成果，而且它还给我们以方法论的启示。这就是：要研究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人物，除了研究大的历史环境外，还要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如果他曾经生活在国外，那就除了研究相关的本国环境外，还要研究相关的外国环境。

正像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一样，每个民族的学者也都有其独特的知识积累，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特点。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及其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大有益于我们自身的成长和提高。日本的京都学派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鲜明特点的学派，本书的出版为我们了解京都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治学特点提供了一条途径。

狭间先生毕业于京都大学，是当代京都学派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领导过许多研究班，如《五四运动》（1973～1978）、《民国初期的文化与社会》（1978～1983）、《中国国民革命》（1983～1988）、《1920 年代的中国》（1988～1993），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梁启超》是他主持的第五个研究班。目前，狭间教授虽然已经开始主持第六个研究班——《中国共产主义和日本》，但是，梁启超研究班的工作仍在继续。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只是梁启超研究班的成果之一，并不是它的全部。据我所知，有些工作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我们将翘首以待这些新成果的问世。

日文本序

狭间直树

梁启超的名字，也许现在不是那么为人所知。但是，在上一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却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在 21 世纪即将来临，东亚在世界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的今天，梁启超的历史作用也应越来越受到重视。

不言而喻，在文明史转型方面，梁启超的功绩在于输入近代西方文明来重建传统的中国文明。他所提出的“经学革命”、“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不能说是十分完备，但是梁启超不仅一一指明了它们各自的发展方向，而且在创建“国民国家”所必需的政治、法律、经济、哲学、宗教、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进行了高水平的研究。其范围之广实在令人惊诧。在那个文明史转型的过程之中，这些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梁启超的一生，是为世人瞩目的波澜壮阔的一生。尤其是他 1915 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活动，博得了世人的喝彩。适值 43 岁的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点燃了倒袁的火种，袁世凯曾企图用十万元来收买此文而未果。十万元这一数目，从那一时代的劳动工人的月收入仅为十元，而此前袁世凯雇人暗杀孙文的赏金也是十万元即可想而知。

《异哉》一文的发表，令舆论群情振奋。最后护国战争爆发，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在以汉字与文章来维持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文章”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世人称颂的名家章炳麟的一篇文章即可抵“数师兵马”。这是袁世凯软禁章炳麟的时候，执行这一任务的将军所言。

梁启超那时也曾担任过熊希龄内阁的总长，在政界拥有相当显赫的地位。但是他的文章所具有的影响力，却与其政治地位毫不相干，而是来自于他作为舆论界、学术界泰斗的社会声望。这一声望，乃是由于他对西方近代文明之精髓加以吸收整理，普及推广，从而提高“民智”，确立“国民”意识的言论功绩而获得的。

从中华民国成立初期设立“函夏考文苑”的构想一事可以看出，舆论界的名声是与学术界的名气密不可分的。“函夏考文苑”是模仿法兰西学士院而成立的学术界最高机构。发起人是马良，他曾为复旦大学的创立作出过贡献，又一度代理过北京大学校长，而且了解西方并精通西学，马良将严复、章炳麟、梁启超与自己置于“函夏考文苑”的首席之座。严复是以其翻译巨著《天演论》而闻名的西学（英学）巨匠。章炳麟是中华“宏硕壮美之学”的主将和公认的国学大师。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在这一领域中所占的显著地位。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新会东邻澳门，以南宋亡国悲剧之地——厓山而闻名。1929年梁启超病逝于北京。虽然屈指五十七个春秋，绝非可以称之为长寿，但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2年）所收录的文章约920万字，而参照李国俊的艰辛之作《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可知未收录者尚甚多，推算所有著作文字当不止于1400万字。

梁启超出生在一·贫困的乡村文人的家庭。父亲以教授私塾来维持生计，屡经科试却连“生员”也未能得中。梁启超自小被誉

为神童，11岁就考中“生员”，16岁早早地成为“举人”，可谓一跃三级。在这一时期，他不仅学习科举考试所必需的内容，也对清末流行一时的“训诂词章”之学下过一番工夫。

如果沿着这条道一直走下去的话，也许历史上就不会留下他那么多的足迹。这一转折是在1890年，以18岁的梁启超与康有为相识为契机而开始的。康有为长梁启超15岁，广东省南海县人。康有为认为清末所盛行的学问全是无用的，梁启超为其学说所折服，立刻成为他的入室弟子。

在此之前，梁启超在上海看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开始对世界有了新的了解。他认识到中华只不过是世界之一隅，而中华之外还有高度文明的西方各国。徐继畲被称为“东方的伽利略”，而《瀛环志略》对梁启超来说，则无异是“地动说”。

众所周知，幕府末期到上海来的日本人，非常震惊并佩服所目睹的先进的西方文明；《瀛环志略》又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起对日本人的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加速了明治维新运动的步伐。但是，梁启超得以阅读此书却是在它发行了40年之后。中华文明是高度成熟的文明，但是它的博大性同时也成为其自身转型过程中的阻碍。即便是转型，也正是因为梁启超发挥了吸收西方近代文明的主将的作用，所以不得不说，中国知识分子的反应依旧是过于缓慢，大致晚了一代人，约30年的时光。

如何将理应置于至高地位的“中华”观念与自身处于西方之下的现实来加以权衡兼顾，是困扰所有清末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式，是以中华精神为本体来利用西方技术的“中体西用论”。然而，这并不是以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康有为开辟出来的“康学”，是试图用公羊学的“三世说”，通过统一把握传统中华与近代西方的文明的先后关系，从而使吸收西方文化成为一条可行之路。梁启超接受康学，则是借鉴这一“思路”，从世界的水准来思考中国问题的。

与康有为相识之后的梁启超的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0～1898）从1890年成为康有为的弟子，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在国内从事变法维新运动，可称为“维新运动时期”。

第二阶段（1898～1912）从1898年秋流亡日本，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归国，在国外宣传改革言论，可称为“流亡宣传时期”。

第三阶段（1912～1920）从1912年秋归国，到1920年春，担任内阁总长等职，从事实际政治活动，可称为“民国从政时期”。

第四阶段（1920～1929）从1920年春到病逝，他退出政界，奋笔耕耘、勤研教育，可称为“文化活动时期”。

第一阶段，梁启超秉承康有为的学说展开活动，不久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变法维新运动。以明治维新为蓝本的戊戌“百日维新”，由于西太后的反击功亏一篑，刑场上，谭嗣同如流星般陨落。梁启超将之喻为投鹿儿岛湾而亡的日本僧人月照，并且意识到他自己将会扮演怀志继起的西乡隆盛的角色，从而毅然流亡日本。据说当时在《时务报》等刊物撰文宣传新思潮的梁启超的名气，业已超过了其师康有为。

第二阶段，流亡日本之后的梁启超曾游历澳大利亚、美国等地，致力于扩大保皇派（立宪派）的势力与影响。与孙文的合作尝试、与革命党的“死战”，都是这一时期的一段插曲。不过，他活动的主旨是通过《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来鼓动提高“民智”、确立“国民”意识。为了呼应国内清政府君主立宪的准备工作，他在《国风报》等发表的文章带有一种强烈的建议性的色彩。文明的“掌舵人”这一评价就是在这时期确立下来的。

第三阶段，梁启超主要活跃在政治舞台。袁世凯任总统时，